资本逻辑是如何数字化的？
——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及其批判

How Capital Logic is Digitiz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Criticism of Digital Capitalism

闫培宇 /YAN Peiyu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摘　要：数字技术不仅变革了人类生活，也变革了资本主义。历史地看，数字技术实现了非物质劳动对物质劳动的支配，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后福特主义，也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尽管数字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的升级，但其并未超越资本的剥削本质，反而加剧了资本矛盾运动，也酿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危机。诚如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是大势所趋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坚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如此，才能克服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危机，构建数字中国的未来道路。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资本逻辑　元宇宙　危机　数字经济

Abstract: Digital technique changed human life meanwhile reformed capitalism. Historically, digital technique caused the revolutionary domination of immaterial labor over material labor, therefore posed capitalist production towards post-Fordism hence created digital capitalism. Although digital capitalism upgraded the production from the information era to the intelligent time, it has not overcome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Instea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intensified, thus leading to the crisis of digital capitalism. Inde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eeds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digital capitalism, which enlightens us insist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for overcoming the global crisis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constructing China's digit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Capital Logic; Metaverse; Crisis; Digit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03; C9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04.012

引　言

当前资本逻辑已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无可置疑的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之迅速、深远与广泛，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 所谓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是“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2]，p.42）而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依托数字技术提高周转率、降低成本以实现资本增值，[3] 是资本逻辑的数字形态。历史地看，资本逻辑的数字化实则是国际资本过度积累与扩张在空间维度达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范式转换研究”（项目编号：22&ZD01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蕴研究”（项目编号：21CKS054）。
收稿日期：2023 年 2 月 3 日
作者简介：闫培宇（1990–）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剑桥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 njuypy0215@outlook.com

到极限的产物，是将资本增殖从现实世界植入虚拟世界的结果。以至于在当下，“资本主义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普遍化了。”[4]事实上，数字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化中已然是大势所趋，资本与数字技术俨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历史维度：即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却又不能完全支配数字经济，而数字技术尽管具有革命性力量，但也存在失控的风险。正因如此，破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之谜，不仅需要从科学技术维度出发的形而上学反思，而且需要进入资本逻辑数字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还原数字经济的哲学真命题。

一、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

资本逻辑数字化的底层逻辑，是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后福特主义（Fordism）是对福特主义的生产革命，是以数字自动化（digital automation）生产取代流水线生产，以扁平化（flattening）的计算机管理代替科层制（bureaucracy）的管理，其结果是数字指令（digital command）成为人参与生产的主要方式。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一方面导致了数字化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5]将大量产业工人赶出工厂；另一方面制造了资本周转的消费部类急剧扩大，使得社会管理、服务与科技等部门大规模扩张，产生了庞大的脑力劳动人口。工人阶级谋生不再主要依赖于资本生产部门，而是主要依附于资本的再生产（包括消费、服务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劳动力生产的矛盾也从生产空间转向生活空间，工人阶级谋生的意识也超过了其阶级意识。在此意义上，后福特主义所带来的劳动革命，不仅变革了劳动力构成，而且消解了工人阶级主体性，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资本主义扩张。

首先，尽管数字技术变革了人类生活，但并未使人类在技术维度上摆脱人的此在沉沦于物的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不仅在工具意义上组成人类身体的外延，而且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中介着并异化了人类生活，后者塑造了人之此在的现代性样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6]数字技术之于人的此在的沉沦，不仅在物化（Verdinglichung）意义上使人为数据支配，而且在物象化（Verdinglichung）的意义上不断生产数字化的生活。在现代化的宏观层面，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时间与空间架构。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变革了交往方式，人类社会在进入智能时代后，构建了基于万物互联（IoE: Internet of Everything）的数字总体性（digital totality）。而在愈发趋于万物互联的物堆积背后，实则是数字化物象在愈发极致的算法支配下重建了生产与再生产；但在个体的微观层面，数字技术不仅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而且加速了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节奏。数字技术所制造的虚拟现实在直观意义给与人类感官的反射弧，并且力求缩小这种反射弧，以追求无时差的人机同步，这就是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说的“加速循环系统”。[7]数字技术加速通过数据后台不断完善虚拟现实，进而悄无声息地支配个体生活，以至于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A. Boden）满怀悲观地展望未来道：“届时系统的智能将足以自我复制，从而在数量上超过人类，并且还可以改善自己，从而在思想上超越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将交由计算机负责。”[8]

其次，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是对劳动力结构的变革。数字化生活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反映在劳动力人口上。二战后，在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原子能等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科技进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以至于脑力劳动人口逐渐超过体力劳动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愈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主导。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作为脑力劳动生产，不仅包含“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内容”，[9]而且包括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10]当非物质劳动投入非物质产品——知识、信息、社会关系等——的生产中，资本的增殖也就从生产拓

展到日常生活中去了，（[11]，pp.108–115）如此一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量如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描述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12]他们不事劳作、不进车间、不下生产，而专注于办公室里面的计算机、文书与交往沟通等，形成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这成为数字技术支配下劳动力结构的典型特征。

再次，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也是劳动时间的变革。非物质劳动将资本的增殖从生产带入生活，超越了工作时间（working time）的固定界限，使得资本可以通过操纵生活时间来支配劳动者，因而产生生命权力（biopolitical power）。（[11]，pp.140–150）而生命权力通过渗透和控制生活时间，全面主导生产和生活空间。举例来说，如果工作时间是8小时，此外16个小时就是生活时间，前者直接为资本权力支配，后者则受到生命权力控制。如此，在以计算机、信息、知识等为中介的全自动体系生产方式中，生命权力成为资本渗透的中介、生活时间中有非物质劳动的展开、资本因而实现增殖，三者相互支撑（图1）。如此一来，数字技术对劳动时间变革，实质把剥削扩大到生活时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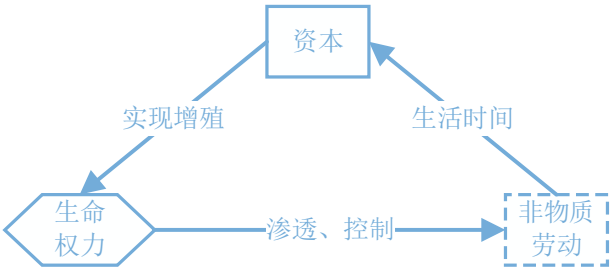

图1 非物质劳动、资本、生命权力结构

再次，数字技术还产生了对劳动空间的变革。生命权力不仅支配生活时间，而且支配生活空间，并在空间层面对生命的控制和调节，如社交软件的功能限定、电商平台的规则设计以及电子游戏的秩序管理等。一方面，数字化的虚拟空间被构建出来，资本则是推动其空间拓展的原动力，使之成为资本积累的增值空间。这是因为，后福特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陷入普遍的过度积累困境，生产的、物质的与现实的空间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迫切需要，资本急于寻找实现增殖的新出路、新空间与新领域，并因此转向方兴未艾的数字技术，在虚拟世界中构建起资本剥削的新空间；另一方面，资本也通过生命权力主导物质生产。（[11]，pp.108–115）由于互联网、赛博空间、虚拟现实等逐渐地渗透、控制与接管了生活空间，数字化的生活由此产生，并悄无声息的支配人的物质需要形式，并因而主导物质生产按照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式展开。如此一来，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在空间意义上完成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本增值的新模式。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升级

资本逻辑数字化的历史实质，是资本积累的数字资本主义形态。丹·席勒（Dan Schiller）最先定义了数字资本主义：“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3]，p.5）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历史性，那就是表面上伴随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发展起来，实则是影响、支配到决定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将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异化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升级。

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实现了供给侧的生产技术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与新自由主义带动下，[13]一大批半导体、计算机与互联网公司迅速发展，数字资本因此迅速积累。席勒就感慨道：“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14]，p.241）数字资本主义在表面上似乎是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而实际上不过是资本积累的新“赛道”，它内嵌于西方式现代化中。数字资本主义有着其他资本逻辑形态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一方面是生产的变革，是“数字化革命使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成本大幅下降”。（[15]，p.2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过程中，通过电子商务大大提高了资本生产、流通与管理的效率，英特尔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就指出："半导体产品的产值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每80个月就会翻一番。任何事物，只要与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就会毫无例外地变得更快、更小、更便宜。"[12]

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完成了需求侧的科技产业革命。"2008年金融恐慌中断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发展阶段"，（[10]，p.71）但是也带给了数字资本新的发展机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刺激下，数字技术发展获得了更多融资、形成独立产业、走向金融资本数字化，进而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大工业的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流水线生产的革命，这两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分别是信息自动化与智能化生产的革命，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图2）。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升级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作为固定资本被投入资本生产，以提高资本的生产力、剥削率与周转率。随着互联网与自动化技术应用，资本生产以信息指令的方式进行，这是所谓自动生产（automatic production）的典型特征。在数字生产中，人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但仍掌握对生产的控制，数字资本不仅在生产中发展出独立的组织方式，而且在流通中建立起独立的市场秩序。无怪乎席勒会指出："资本对网络连接性（network connectivity）的占用和专有，实际上彻底改造了大工业的劳动过程，以往因为劳动分工而彼此互不连属的生产部门，被网络整合成集体协作的生产过程，并与更高级的劳动过程直接对接"。（[13]，p.13）数字生产直接对接生产与消费，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都被大大降低，这也推动智能生产升级。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升级使人类迈入智能时代，以智能生产为前提，数字资本主义才真正实现了数字化资本积累。智能生产（Smart Manufacturing）是由人工智能中介的生产方式，[16]不仅将整个生产过程交给智能系统，而且通过区块链（block chain)技术产生近乎零成本、绝对安全以及去中心的生产与再生产架构，这意味着智能生产可以给数字资本主义搭建独立的、从生产到再生产环节的资本循环。在资本循环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形成了独立的价值增殖链条：即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形式、流通中的数据化价值形式、元宇宙形式的新市场。

其一，智能生产中，以工厂、公司为中心的集中化生产模式，转变为个体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劳动模式。并且个体往往不直接从事物质劳动过程，而是将对物质的加工、装备与物流等作为生产模块交给人工智能。这样一来，"数据训练和赋予计算程序竞争优势；能够协调和外包给工人；它们允许生产过程的优化和灵活性；可以将低利润货物转化为高利润的服务；而数据分析本身又生成数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3]，p.48）

其二，在资本流通中，价值形式也以数据化的方式存在。一方面，数据直接是价值载体。数据既是个体、组织与国家等消费的对象，后者也直接就是数据的生产者。不仅如此，数据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也可以作为价值符号，发展成为数字货币、金融衍生品与信用形式，后者则直接支撑起完整的资本流通过程。譬如，Apple Pay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形式，使用Apple Pay的消费者账号上的余额本质上是信用，并且这种信用可以被使用去置换商品。商家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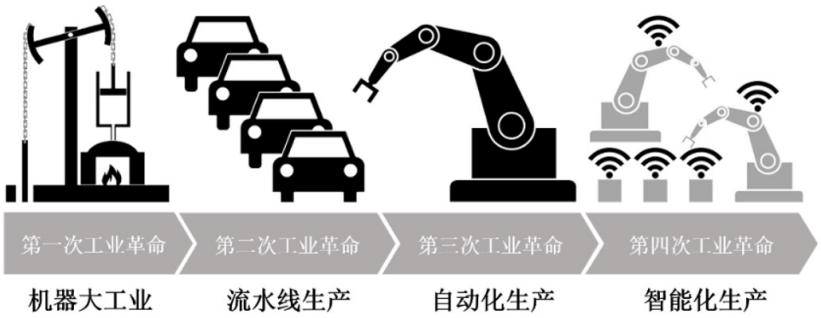

图2 工业革命演进

到也是被数据化的信用形式，而只有当与商品等值的信用额度被转入银行账户时，商家方才获得出售商品的货币。而这个过程中，Apple Pay仅仅负责数据结算，而银行才负责货币的结算，二者是平行的。因此是微信在银行取得信用支撑了Apple Pay，而不是Apple Pay本身就是货币，因为它不具有独立得流通性，而只是虚拟的、数字化的信用形式；

其三，如果说市场是资本积累的空间，那么元宇宙则是资本积累的数字化市场。元宇宙作为市场的属性，来自于元宇宙被应用于平台的搭建。所谓平台（platform），指的是“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能够承载两个及以上群体的交流互动”。（[3]，p.49、50）平台作为虚拟的空间，是数据作为交换价值发展的必然产物。平台通过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将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同时集中在用户身上，进而构建起独立的资本增殖空间。譬如平台上的短视频用户，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平台中，不同消费者可以直接影响生产，生产者也可以直接进行消费。所以平台本身就是固定资本，也可以如土地资本那样产生租金。

平台的发展、丰富与扩大，最终产生元宇宙。元宇宙（Metaverse）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整体，此概念最早由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提出，他在其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将词根meta–和universe合在一起，才有了metaverse这一概念。近年来，元宇宙被作为商业概念流行起来，被作为是虚拟现实进入现实生活的商业构想，并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图3）。[17]

元宇宙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式开放平台，不仅是更大的平台，而且有内在的自律性。如果说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是其自律性表现，是相对于自然界的“第二自然”（Die zweite Natur）。所谓“第二自然”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自律性，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黑格尔认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仅仅“隶属于自然界”，而在共同体中则得到“更高的规定”。他在《法哲学原理》的第151节中将这个“更高的规定”称之为“第二自然”（eine zwe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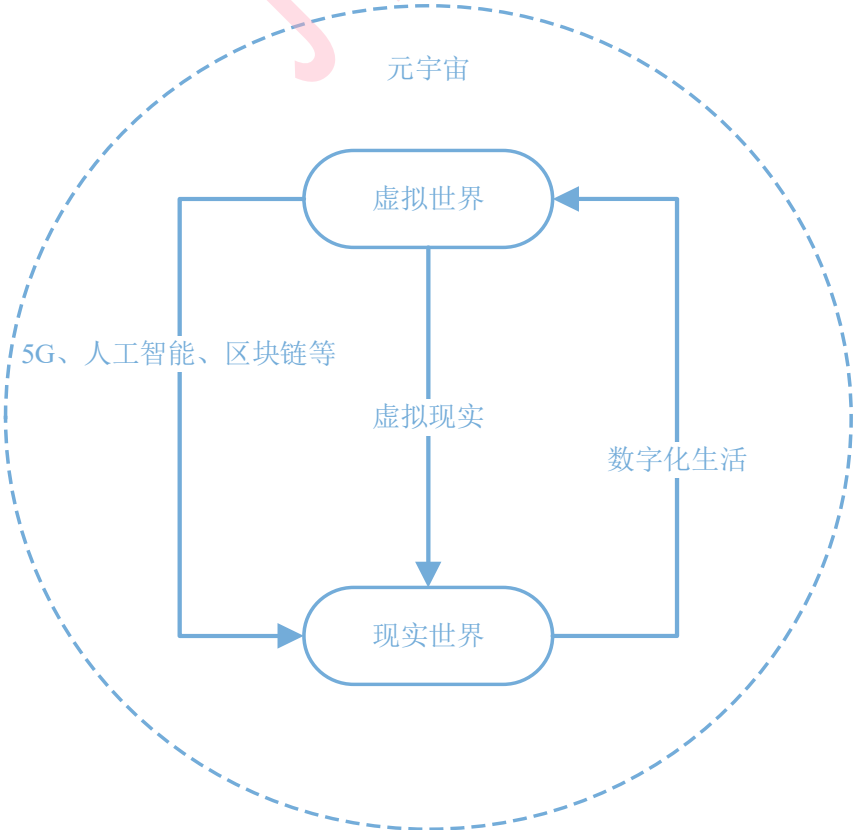

图3 元宇宙结构

Natur),认为“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是作为“第二自然”而“取代了最初纯粹的自然意志”的。[18] 与“第二自然”相类似，元宇宙则有相对于实体市场的独立性,可以说是“第三自然”(Third nature)。“第三自然”的自律性表面上看是虚拟世界内部的秩序，而实际上这个虚拟的秩序则是由实体的市场秩序支撑起来。也就是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机制，与市场与自然界的交互机制是一致的。而“第三自然”是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支配，也就像市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一样。在此意义上，作为元宇宙应用的网络游戏、社交网络等也无形中支配着相应的设备硬件与物质世界,既直接体现了“第三自然”的特点，也不断累积着数字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

三、数字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是资本增殖数字化的矛盾运动。众所周知的是，如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超出信息网络的范畴，甚至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元宇宙等都卷入其中。而不论数字资本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推动生产升级，都依旧是按照资本逻辑数字化的方式发展的资本矛盾运动，后者也是导致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资本过度积累。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时间大大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时间的增加不仅“入侵”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在人们尚不自觉地情况下，通过游戏、移动设备与物联网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抛入了数字的海洋中。如此一来，随着数字化的加速与扩大，资本周转、剥削率、资本投入也相应扩大，且产生了更有限自由时间、更孱弱的市场与更低的资本回报率。后者不但加速了资本的过度积累，也加剧了利润率下降的发展趋势，进而加速了数字资本主义走向经济危机。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产生了数字化的劳动异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成为数据不自觉的生产者、消费者与资本积累的中介，由此产生所谓的“数字劳动异化”。其结果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状态也被数据化，人们不仅被纳入数据的生产与消费，而且被动的接收无用的数据，成为不自觉的、无时不刻、无处不在被剥削的对象，且来自虚拟世界的剥削要甚于现实世界。不仅如此，数字资本主义还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人口，尼克·戴尔·怀特福德（Nick Dyer Witheford）就指出：“数字资本机器对人性的压制，使大量的稳定就业之外的剩余人口出现，他们可以被称为赛博无产阶级。”[19] 而赛博无产阶级由于被机器人所替代，甚至会沦为无用阶级（ Useless class)。在此意义上，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 ）形成了，这意味着数字资本将无用阶级彻底隔绝在价值链条之外，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与压迫因此重新固定下来。为此，斯蒂格勒甚至惊呼：“利用1993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网络技术所搭建的全球性网络而实现的交互阅读和书写的出现，数字技术已经推动超级工业社会进入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超级工业时代进入一个系统性愚昧的时代”。[20]

第三，数字资本积累获得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扶植，因此衍生出“数字霸权”(digital hegemony)。由于数字资本积累的加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就将数字技术视为国际资本竞争的重点，数字霸权因此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其国际资本所积累的优势，构建起对于数字技术的全球垄断，扩大对世界各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横加干预、破坏和侵略，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棱镜计划”(Prism)。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成为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问题，而且也是数字霸权操控经济的重点。就此而言，能否围绕先进的数字技术发展安全、繁荣以及可持续的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已经是关系到世界各国国计民生的大事。尽管如此，纵然数字霸权的目的是通过国际资本竞争扩大资本积累，但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却导致了数字资本过度积累、数字资本利润率下降、数

字资本主义滑向危机。

剖开现象看本质，纵然数字资本主义已经走入智能时代，但是其积累模式仍未超越晚近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范畴：即依托跨国资本形态、全球化进程与数字技术迭代展开的资本积累模式。然而，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扩大，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同时，也使得数字资本不可避免的陷入过度积累。如此一来，过度积累状态的资本为了实现增殖，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是数字技术迭代加速的一个驱力。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的悖论也因此产生：即随着数字技术的几何级发展，消费能力却只能以算数级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因此在数字经济的繁荣之下，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剥削，这必然最终引发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经济危机。[21]事实上，正是在数字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21世纪，亚洲金融危机（Asian Financial Crisis）、2007年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与2010年欧债危机（eurozone debt crisis）相继爆发，而这种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激烈和反复的状况，也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显著特征。

四、何以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危机？

无可置疑的是，数字资本主义固然将人类社会带入数字经济时代，但也导致了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世界银行在2022年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在新冠病毒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全球衰退仅仅两年后，世界经济再次陷入陷阱。此次全球经济同时面临着高通胀和缓慢增长。”[22]当前全球经济的持续衰退与数字资本主义危机密不可分。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资本过度积累，导致了利润率下降，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扩张也产生了虚拟经济的片面繁荣、实体产业持续萎缩、通货膨胀愈发严重等现象，更导致了危机的持续、深化与周而复始。由此可见，能否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危机，这是关系到全球经济能否走出衰退怪圈的关键。

科学把握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是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危机是利润率下降一般规律的必然。所谓利润率下降一般规律（Alloemeines Gesetz vom Sinken der Profitrate/Law of the Diminishing Rate of Profit）是“由于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相比于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材料等）的比重趋于降低，导致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下降的趋势。”[2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他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论点：假定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利润率p'可以直接表示为M/(c+v)。又有剩余价值率为M/v，资本有机构成为c/v，则利润率公式则可以变形为：

$$p'=M/(v+c)=(M/v)/(1+c/v)$$

可见，资本的有机构成c/v越大，则利润率越低。基于这一推理，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为了增殖，而必然不断投资不变资本，这也因此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利润率的必然下降。而由于资本扩张，利润率下降趋势最终将资本主义推向不可避免的危机。数字资本主义亦莫能外，资本对数字技术的不断投入，实际上也是在持续投资不变资本，因而也不断推高了数字资本的有机构成，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就此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仍未超出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规律。

何以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危机？必须坚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正确方向。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数字化也不等于数字资本主义。在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逆周期的历史区间内，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已经从增量逻辑（increment logic）转向了存量逻辑（stock logic）：即从经济上行期的总体资本积累模式，转向了经济下行期的局部资本积累模式，这突出地表现为“内卷”现象扩大、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新冷战”思维甚嚣尘上。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给世界经济的提供共同繁荣的未来蓝图，数字资本主义野蛮扩张所留下的景象，是实体产业的萧条、失业率的激增与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现代化不等

于资本主义化。数字经济怎么发展、发展的怎么样？评判标准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转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资本逻辑凭借数字技术愈发深化对人的支配，人类也愈发受困于资本的技术囚笼中丧失对自身的主宰。如此，则不用人工智能去取代人类，人类在此之前恐早已沦为技术之下的无用之物。所以数字资本主义并不会真正实现人的发展，而只会走向资本过度积累所导致的数字经济片面繁荣。党的二十大报告正是在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病，才会强调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发展数字技术，这是克服数字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未来前途。所以，要将数字经济蓝图落实到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如此方能实现数字技术进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步力量。

［参 考 文 献］

[1]Ibrahim, Y. *Posthuman Capitalism Dancing with Data in the Digital Economy*[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12–18.

[2]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2.

[3]丹· 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丹· 席勒.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 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 翟秀凤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52.

[5]William, I. R. 'The Next Economic Crisis: Digital Capitalism and Global Police State'[J]. *Race & Class*, 2018, 60(1): 77–92.

[6]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31.

[7]哈特穆特·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41.

[8]Boden, M. A. *AI: Its Nature and Fu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7.

[9]Lazzarato, M. 'Immaterial Labor'[A], Vimo, P., Hardt, M.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33.

[10]Hardt, M., Negri, A. *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12]Florida, R. '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 Why Cities Without Gays and Rock Bands are Los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ace'[J]. *The Washington Monthly*, 2002, 34(5): 15–25.

[13]丹· 席勒. 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吴畅畅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14]丹· 席勒.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 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 翟秀凤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5]乌韦· 让· 豪斯. 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新经济及其后果[M]. 许红燕、张渝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6]'On the Journey to a Smart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EB/OL]. https://www. industryweek. com/print/content/21967056. 2015–12–30.

[17]Neal, S. *Snow Crash*[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2, 22.

[18]Hegel, G. W. F.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M]. Bd. 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301.

[19]Witheford, N. D. C. *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M]. Toronto: Pluto Press, 2014, 201.

[20]贝尔纳· 斯蒂格勒. 南京课程: 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M]. 张福公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41.

[21]Mandel, E. *Late Capitalism*[M].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75, 184–223.

[22]A World Bank Group Flagship Report.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M].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Group, 2022, xv.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450.

［责任编辑 李斌］